

策兰与海德格尔

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

**Paul Celan and
Martin Heidegger**

An Unresolved Conversation, 1951-1970



同文馆·思想家对话丛书



〔美〕詹姆斯·K. 林恩(James K. Lyon) 著

李春 译

主编：周宪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主编：周宪

策兰与海德格尔

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

**Paul Celan and
Martin Heidegger**

An Unresolved Conversation, 1951-1970

〔美〕詹姆斯·K. 林恩(James K. Lyon)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9 - 07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美)林恩(Lyon, J. K.)著;李春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

(同文馆·思想家对话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17193 - 6

I. 策… II. ①林… ②李… III. ①策兰, P. (1920—1970) - 哲学思想
②海德格尔, M. (1889—1976) - 哲学思想 IV. ①B565. 59 ②B516.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3425 号

Paul Celan and Martin Heidegger: An unresolved Conversation, 1951—1970

© 200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书 名: 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

著作责任者: [美]詹姆斯·K. 林恩 著 李 春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7193 - 6/B · 090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63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保罗·策兰与马丁·海德格尔在 1967 年的会面,是 20 世纪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乔治·施泰纳(George Steiner)称保罗·策兰这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诗歌“将进入最伟大的西方文学之列”。^[1]而后者则是 20 世纪最有创造性、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而在 1933 年加入了纳粹党。他们两人的会面,在许多专著、报刊文章、文献资料集、学术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章节以及简明的参考资料中,都有所阐释。

与目前所见的批判性观点不同,策兰与海德格尔的会面,在这位诗人的一生中,或许算不上是最有戏剧性的或者最重要的事件,同样,在海德格尔的一生中,也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事件。然而,这两位似乎完全对立的重要人物,在长达 20 多年的关系中,呈现出某种不协调性。这总是引人遐想并亟待解释的,尤其是考虑到它对策兰的重要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对他们会面的背景做一番考察。

由于此前人们对策兰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全部关系了解甚少,批评家们很少提到这个宏大的背景。比如,众所周知,这位诗人在 1951 年开始阅读海德格尔,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借用了他的概念和隐喻,而且在 1970 年去世前,也就是在 1967 年他们那一场被认为是很不幸的会面之后不久,他仍在继续阅读和研究这位思想家的著作。很多批评家也不知道,策兰的藏书表明,他仔细地阅读过海德格尔的 20 多种著作,而这位思想家在策兰建构自己的诗学理论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学者们也没有注意到,多年来两人之间保持着通信,而策兰也把自己的诗集赠送给了海德格尔。最后,也没有人试图分析这些问题:这位

vii

[1] Steiner, "Song of a Torn Tongue," 1093.

思想家对策兰的诗歌有多高的评价；他又是怎样急切地想要鼓励和督促他（比如，试图为他在一所德国大学谋得教职）；为了接近他，他又在多少本自己的著作上亲笔题写了献给策兰的题词（至少 10 本）；而因为不能与这位心理失常的诗人取得“联系”或给他提供帮助，他又是多么地沮丧。

2004 年初（在最新的手稿付梓后不久），阿德里安·弗朗士-拉诺尔（Hadrien France-Lanord）的著作《保罗·策兰与马丁·海德格尔：对话的意义》（*Paul Celan et Martin Heidegger: Le sens d'un dialogue*）在巴黎面世。弗朗士-拉诺尔注意到了策兰所收藏和阅读过的海德格尔著作，由此考察了他们的精神对话的几个方面。他的著作是哲学性的、思辨性的，但对策兰的生平却语焉不详。他无意对两人之间发生关系的背景以及策兰从海德格尔那里获得的文学灵感做严密的考察，也无意就这两位对立者之间离奇的相互吸引力中所包含的人性的复杂做出分析。

与之相应的是，我将在本书中考察目前已有的相关材料，并就两者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完整的故事版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策兰曾在英博柯·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和克劳斯·德缪斯（Klaus Demus）的信中讨论过海德格尔，但收录了这些信件的两部主要书信集，到目前为止仍然禁止学者查阅。本书将提供一个梗概，以便作为将来进一步考察两位智者——两位具有巨大创造力的、思想上的共同点远远超越了民族、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极大差异的天才——之间的复杂联系、互动和呼应的起点。如果说这位诗人从海德格尔那里所得到的，比这位思想家从他那里得到的要多，那么，目前这项研究的焦点就应该集中在策兰身上。总的来说，可以把它看成是他与海德格尔两人的历史和精神传记，是对两人的关系中那些矛盾的、不协调的因素的一种分析。本书同样会考察策兰是怎样把海德格尔“翻译”到自己的著作中，并以此方式来阅读、回应、拒绝、接受，或修正海德格尔的思想的。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海德格尔对策兰的关注并没有太多的记录，而在根本上，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主要是对学生一方而言的，所以，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关注将不及对策兰的

关注那么深广。

在1967年初次会面之前,海德格尔在策兰复杂的成长过程中,主要是作为一位无意识中的精神导师和崇拜对象而存在的,一直到1959年。而同时,作为前纳粹分子之一,他也无意中成为了这位年轻人愤怒和敌视的对象。这里的研究将试图呈现他们1967年会面的背景,并表明我们对这次会面前后的情况的有限的了解,是怎样地误解和扭曲了他和海德格尔通过虚拟的对话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关系的。

viii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我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叙述和分析这一话题。研究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在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在策兰眼中,这是他的污点,并让他终生都成了无法回头的纳粹分子——之间的关系,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进行一番思辨和精神分析。我拒绝了这一冲动。通过文献资料、回忆录和我认为可靠的信息提供者的口头报告,我建立起了一个分析和阐释的具体基础。比如,我没有像一般的做法那样,将策兰的诗歌中的字句和概念与海德格尔的著作联系起来,除非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策兰阅读过相应的著作。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阅读过他所收藏的海德格尔的其他著作(见附录)。这仅仅是说,我不愿意把这样的推测作为证据,除非有关于他阅读、评论过何种著作的确切而足够信息。当我的分析显示出推测性的时候,我将会做出说明,并把它建立在那些令人信服的文献资料上。

这项研究有另外一种限制。尽管它集中关注的是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一位前纳粹分子之间疑问重重的关系,但我并没有纠缠于海德格尔在第三帝国中的行为所引出的罪名这一问题。我很熟悉那些谴责他的行为的著作,同样也很熟悉那些似乎能部分地减轻他自己已经承认了的那个可怕政治错误的材料。我个人可以为这场辩论带来点什么,但也仅仅集中在策兰对海德格尔——在策兰看来,他与纳粹分子及其意识形态的关联是很明显的——在认知上。在某种程度上,策兰想要谴责海德格尔的过去,然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想从自己极度崇拜的海德格尔那里,获得一种对那些无法解释行为的解释。

某些人也可能认为,这项研究的另一种限制在于,是什么把策兰引

向了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他截然相反的人,我的回答并不能让自己满意,也可能让很多读者不满意。当我指出这一问题不可能得到回答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拒绝回答这一问题。一开始,我觉得有些答案似乎有道理,甚至提供了一些暂时的答案。但随着研究的推进,矛盾也变得更明显、更刺眼和无法调和了,而任何答案,最终都无法把握 20 世纪最复杂的两位人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我只是试图解开和分析这些矛盾,而不是解决它们。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决定使用翻译。尽管在德语中,策兰和海德格尔的用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只有在理解了他们的特定用语之后,才能够理解。另外,当然,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是不可译的,或者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排斥翻译的。为了和原文中的特定用语进行对照,所有引文都以英文译文的形式出现,后面附上德文或法文的原文。其他语种的引文材料,则都以英文的形式出现。

在英语世界中,现有的对策兰和海德格尔的翻译,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彼此相距甚远,而且能够获取的程度也有所差别。出于这些原因,我自行翻译好策兰和海德格尔的许多段落。尽管在很多时候我需要依照他人的作品,特别是约翰·费尔斯坦纳(John Felstiner)对策兰的精彩翻译,让我不得不对别人的英文翻译做出不止一处的修改。对此,我将承担全部责任。在我使用了前人的翻译的地方,都清楚地表明了译者并致以谢意。而那些没有标明来源的引文,则是我自己的翻译。在翻译海德格尔的名词的时候,我一般都遵循了广为人知的英语中的用法(比如 Rede = discourse, Gerede = idle talk or conversation, Ereignis = event of appropriation, Unverborgenheit = unconcealment 等等)。与已有的用法相一致,我在英文中保留了 Dasein(此在)这个词。另外,为了消除海德格尔的著作英译标题的差异以及译者在引用时的差异,我一律遵循了爱德华·奥瑟斯(Edwald Osers)在为吕迪格·萨夫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的《马丁·海德格尔:善恶之间》(*Martin Heidegger: Between Good and Evil*)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所使用的标题。

这本书的完成,得益于许多个人和机构的热忱。我要感谢多丽丝·阿勒曼(Doris Allemann)、罗伯特·安德烈(Robert André)、让·波

拉克(Jean Bollack)、本哈德·博辛斯坦(Bernhard Böschenstein)、罗尔夫·布赫尔(Rolf Bücher)、理查德·赫根(Richard Hacken)、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赫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mann)、马丁·谢弗(Martin Schäfer)和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in Marbach)的员工们为搜集和评估策兰与海德格尔的相关资料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我还要感谢爱德华·卡特勒(Edward Cutler)、史蒂夫·桑德罗普(Steven Sondrup)和我在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同事马克·拉索尔(Mark Wrathall)。他们阅读了部分的手稿,并给出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我要感谢策兰的主要著作《作品:历史与批评全集》(*Werk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的总编、策兰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阿克瑟尔·格尔豪斯(Axel Gellhaus)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其中包括在2001年提供机会到汉堡大学举办的策兰- x
海德格尔研讨会上展示我部分的初步研究成果。我同样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约翰·费尔斯斯坦纳。他所编订的策兰文学年谱和所翻译的策兰诗歌、散文,对这位诗人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者来说,算的上是标准的作品。

我的朋友和同事汉斯-威廉·凯琳(Hans-Wilhelm Kelling)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热诚地帮助我解读海德格尔和策兰那些几乎无可索解的文章,而我的研究助手约瑟夫·鲍姆加登(Joseph Baumgarten)则追踪了许多模糊的线索,并在我准备手稿期间,提出了许多技术上的建议,从而减轻了我的负担。对他们的努力,我是同样要表示诚挚的谢意的。杨百翰大学人文学院通过授予我Scheuber-Veinz教授头衔的方式,为我提供了足够的基金用于旅行和购买图书。

贝特兰德·巴迪乌(Bertrand Badiou)、埃里克·策兰(Eric Cella,诗人策兰的哲嗣)、赫尔曼·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嗣)和维尔纳·韦伯(Werner Weber)让我查阅或者为我亲自提供了与我的课题有关的原始文献和照片。赫尔曼·海德格尔为本书的完善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私人性帮助,也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我本来无法看到的材料。三十年来,我还与策兰早年在维也纳和巴黎的密友克劳斯·德缪斯保持着热情的通

信,并采访过他。这对我都是非常有益的。我要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我要把最深的谢意,留给一位书目编订者和两位良师益友。

xi 这位书目编订者就是杰瑞·格林(Jerry Glenn),同样也是一位著名的策兰研究者。他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几十种语言中搜集策兰的书目信息。他所编订的书目,特别是他对我一次次重复的疑问的回答,才使得我有可能摆脱那些浩如烟海、有可能让人厌弃策兰研究的第二手文献资料的纠缠。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无法言表的。另外,充当了我的良师益友的,是一位我缘悭一面之人。没有她的著作,这项研究将无法进行。在过去的十年中,芭芭拉·维德曼(Barbara Wiedemann)对策兰和策兰研究的著作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让更多在此前几十年不为人知的原始资料得见天日,其中包括书信、笔记和生平信息。我要向感谢她所提供的教益。此外,她在阅读了我的手稿之后,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让我的著作增色不少。最后,我要感谢奥托·珀格勒(Otto Pöggeler)为我提供了关于策兰与海德格尔关系的最生动信息。他还接受了我的专访、与我保持通信,并特地公布了他所掌握的关于策兰生平的第一手知识。尽管对某些事件的记忆不太确定,但他称得上是一位可靠的、精确的信息提供者,一位高尚而乐于助人的人。我要感谢他拓展了我对策兰和海德格尔的关系的理解。

关于引用和缩写的说明

除非有特别的说明,所有对策兰和海德格尔著作的引用都来自如下版本:

Paul Celan, *Gesammelt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ed. Beda Allemann, Stefan Reichert, and Rolf Bücher(Frankfurt a. M., 1983)。尽管策兰的著作有更新的单行本,但这个版本是最容易获取的,并且它也是策兰在有生之年计划出版的个人著作集的最完全版本。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Ausgabe letzter Hand*, general editor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mann(Frankfurt a. M., 1979—)。这个

标准的版本,计划出版 102 卷,目前仍未完成,不时有新的单册面世。

在任何情况下,来自这两个版本的引文都会在文末标明卷数和页码——*GW* 表示策兰的 *Gesammelte Werke* (作品全集),而 *G* 则表示海德格尔的 *Gesamtausgabe* (全集)。因此,策兰的引文后如果有“*GW* 3: 110”,这表示这首诗在上述版本的第 3 卷第 110 页。海德格尔的引文后有“*G*12:175,193,207”,则表示海德格尔上述著作的第 12 卷第 175、193 和 207 页。

策兰的《子午线》(*Meridian*)演讲和这些演讲所依照的大量笔记,都采用了“子午线”这个词作为标题。为了避免混淆,我在文中采用了加引号的“*Meridian*”来指策兰的演讲,用斜体的 *Meridian* 来表示策兰出版的笔记。这本书的页码前面将有缩写的 *DM* 字样,表示德语标题 *Der Meridian: Endfassung, Entwürfe, Materialien* (《子午线:定稿、草稿与材料》)。

策兰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的笔记,在本文的引用中,将以字母 *B* 来标注,紧随其后的是页码。这个字母指的是 *La Bibliothèque philosophique* (*Die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哲学藏书): *Catalogue raisonné des Annotations*。

xii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对立者的相斥与相吸	(1)
第二章 走近海德格尔 ——策兰阅读《存在与时间》,1952—1953	(11)
第三章 与海德格尔“发生关联” ——1952—1954	(25)
第四章 海德格尔在策兰早期作品中的影子 ——1953—1954	(36)
第五章 《何谓思想》和《形而上学导论》笔记 ——1954	(48)
第六章 怀疑增加,问题出现 ——1954—1956	(63)
第七章 对海德格尔的更多借鉴	(77)
第八章 走近又疏远海德格尔 ——1958	(91)
第九章 认知的差异性增加,独立性增强 ——1959—1960	(103)
第十章 作为催化剂的海德格尔 ——策兰开始撰写自己的诗学,1959—1960	(130)
第十一章 《子午线》 ——一场“与海德格尔的隐性对话”,1960	(145)

第十二章	陷入“最孤独的孤独”中 ——1960—1961	(161)
第十三章	对话继续:海德格尔阅读策兰的《子午线》 ——1960—1961	(175)
第十四章	“一场划时代的相遇” ——弗莱堡与托特瑙堡,1967	(190)
第十五章	《托特瑙堡》及其后果 ——1967—1968	(206)
第十六章	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语言的吸收 ——相似、关联,借鉴	(228)
第十七章	没有解决的矛盾 ——最后的岁月,1968—1970	(241)
第十八章	也算结论	(256)
已知的策兰阅读过的海德格尔的著作		(260)
参考文献		(262)
索引		(269)

第一章 对立者的相斥与相吸

很难想象,在 20 世纪的文化生活中,还会有哪两位人物之间的对立,能与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之间的对立相提并论。自 1945 年以来,在任何一种西方语言中,前者或许都算得上是最重要的诗人。他与海德格尔全然不同。他本名 Antschel(Ancel,安切尔),是出身于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他说着德语长大。德语是他的文化语言,但他是一个能使用多种语言的人。晚年的他一直被一种负罪感折磨着,因为他的父母和大家庭都在大屠杀中罹难了,而唯独自己却幸存了下来。从地理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居住在巴黎的流放者,然而从精神上说,他又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处于一种可称之为“超域界(extraterritorial)”的精神状态中。他曾对巴黎的一位诗友说:“你在自己的家中,在你自己的参照点和语言中,而我在外面。”^{〔1〕}他的政治意识形态将他推向了左派,但他却拒绝附隶于任何政党。尽管他非常真诚,但他喜欢玩把戏,痴迷于双关语和机智的文字游戏。尽管他生性多疑的他看到战后德国的文化机构被前纳粹分子控制着并由此对它表示出了怀疑,但他又拼命地想要获得它的接纳,以让自己的诗歌得到承认。

与之相对的是,海德格尔,这位也许算得上是本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德国最主要的民族主义者。乔治·施泰纳认为,他的生命历程“根源于某个地方”。^{〔2〕}这些根基存在于他所出生的斯瓦

〔1〕 Bonnefoy, “Paul Celan,” 11.

〔2〕 Steiner, *Heidegger*, 23.

比亚(Swabia)的大地与传统中。为了公开表示对它们的忠诚,他曾经头戴阿勒曼尼(Alemannic)农民的绒线帽,并宁愿在与世隔绝的黑森林高处的滑雪屋中写作,也不愿意接受柏林大学的显赫职位。他认为德国是古希腊文化唯一的合法继承者,自己则以这一传统的永久继承人和传承者自命。他那极度狂热的思想和个人生活,却又显得毫无生趣。为了改革德国的高等教育,他在1933年又变成了弗赖堡大学的校长,在纳粹的旗帜下呼唤这座德国大学的重生,并且加入了纳粹党。尽管与迫使他一年后辞去校长职务的帝国之间存在着分歧,他还是继续保持着这个党的党徒身份,直到1945年。他从未公开表示过任何的负罪感,也并未对他作为纳粹分子的去表示过忏悔,而且,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几乎一直对他的国家里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和迫害保持着沉默。

让策兰与这位德国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矛盾的是,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公认的良师益友,都是犹太人。他最亲密的文学知己包括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 1891—1970),而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sip Mandelstam)则更让他感到了某种密切的关联。对他产生了吸引力的犹太思想家包括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弗兰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华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格尔斯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而最著名的则要数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也曾发现某些非犹太裔的德语作家也很有吸引力,特别是荷尔德林、特拉克尔(Trakl)和里尔克,更不用说哲学家尼采了,但尽管如此,对他的世界有决定性影响的大部分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与海德格尔几无相同之处。然而,在策兰和海德格尔以及这些思想家、作家之间,不论是犹太裔的还是非犹太裔的,仍然存在着一条坚固的纽带:他们对诗性语言(poetic language)的浓厚兴趣。

英博柯·巴赫曼向策兰介绍海德格尔

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策兰一度与当时西欧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隔绝,直到1947年由罗马尼亚逃到维也纳。据说策兰首次与海德格尔接触,可能是在1948年。中间人则是他在那里认识的朋友,22岁的诗人英博柯·巴赫曼。那时候,她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欧洲的批判性接受。她坦诚,她认为自己的著作将会把魏玛共和国这一“幕后之王(hidden king)”“赶下宝座(dethrone)”。^[3]她还很天真地相信,他将经受不住这样的攻击。^[4]除了用自己对海德格尔的否定性评价来影响自己的新朋友外,她大概还触及了这位哲学家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立场,因为她为撰写博士论文搜集到了这方面的信息。^[5]这个时候,她很可能还向策兰介绍了海德格尔1933年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发表的著名的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她称自己了解这篇演说。^[6]至少,从她那里,策兰对海德格尔过去的纳粹分子身份有了足够的了解,由此对这位德国思想家产生了怀疑。²另外,她至少还对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和影响力表示了勉强的赞许。^[7]策兰后来也有这样矛盾的态度。

有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尽管策兰和巴赫曼对此深表忧虑,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仍然继续在未公开的通信中讨论海德格尔。据两人的一位朋友透露,1950年,巴赫曼曾送了一本这位哲学家此前出版的《林中路》(*Holzwege*)给策兰。^[8]在他去世后遗留下来的藏书中有

[3] 来自 Van Buren 的著作 *The Young Heidegger: Rumor of the Hidden King*.

[4] 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137.

[5] Bachmann, “Die kritische Aufnahme der Existenzphilosophie Martin Heidegger.”

[6] Bachmann, Karol Sauerland 的采访稿,收入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137.

[7] 同上。在文中,巴赫曼探讨了她对海德格尔的赞赏,同时又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他进行了攻击。

[8] Klaus Demus, 作者对他的采访,1999年6月25日。德缪斯在维也纳与策兰相识,并很快成为亲密朋友。

一本1950年初版的《林中路》，或许就是巴赫曼赠送的那一本。然而，他直到1953年才阅读它。这或许说明了他一开始对海德格尔是很排斥的。又据巴赫曼的传记作者说，1952年，策兰曾送给她一本海德格尔的《论根据的本质》（“Vom Wesen des Grundes”）（有本人的题词），后来仍保留在她遗留的藏书中。^{〔9〕}很明显，他们并没有把海德格尔从自己的思考中排除，不管他们对他在第三帝国的行为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在1948年海德格尔的著作被介绍给策兰之后，策兰有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阅读它们。

然而，在与策兰讨论海德格尔时，让巴赫曼不可能预料到的是，在策兰逐渐成长为一名诗人的过程中，在没有阅读海德格尔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海德格尔了。而这一点，策兰本人也是毫无知觉的。在维也纳驻留的半年中写成的六十页半的诗歌《埃德加·杰尼与梦中之梦》（“Edgar Jené und der Traum vom Traum”）^{〔10〕}中的语言，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某些理由。

策兰的《梦中之梦》，以及海德格尔式的言辞

按照画家埃德加·杰尼（Edgar Jené）的要求，这位27岁的诗人写下了《梦中之梦》，作为杰尼画展的导言。当时，策兰在维也纳刚刚认识了这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的。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他构建自己的诗学理论的最早努力。这首诗以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和被刻画为他的朋友的另一个自我之间虚拟的对话为结构。这场对话发生在作为潜意识的“深海”中。在对话中，说话者试图理解，在诗性语言被滥用（abuse）、误用（misuse）和过分使用（overuse）的时代，它如何能够得到更新。他追问，那些“自太初以来一直在为表现而斗争”的一切，应该如何

〔9〕 Weigel, *Ingeborg Bachmann*, 446.

〔10〕 Paul Celan, *Gesammelte Werke*（这里及以后作GW），3:155—161。关于策兰的诗歌和其他作品，更为完整的批评性-历史性的文本，可以参考两个互相竞争的版本，但两者都没有全部发表这篇作品：*Werk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和 *Celan, Werke; Tübinger Ausgabe*。

淘尽杂质而回复到原初的形态。诗人在回答了这一问题之后,才对杰尼的绘画做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在不知不觉中,策兰所使用的言辞,像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的一样。通过原因或根据(*Grund*)、存在(*Sein*)和“异地的死”(der fremde Tod)等措辞,他所表达出来的对根本性问题的关注,具有一种明显的海德格尔式的语调,并首次提示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通过使用德语词“*Grund*”,策兰进入深海的行为,就意味着寻找隐藏的“根据”或者“理由”。他将深海描述为“美丽的荒野,存在的另一面,更深的一面”(GW 3:155)。他对“存在”这一词的使用,就是对海德格尔整个思想的中心世界的诗性描述。在对语言的本性进行思考的时候,他大量地使用了名词化的形容词:“das Eigentliche(本真)”、“das Neue(新鲜)”、“das Reine(纯粹)”、“das Zeitlose(无限)”、“das Ewige(永恒)”;另外他还使用了名词化的动词和不带冠词的名词性形容词:“Geschehenes(已经发生的)”、“Zusätzliches(所增加的)”、“Gegebenes(所在的)”、“Veränderndes(所改变的)”、“Fremdes(相异的)”、“Fremdeste(最相异的)”。这些用法与海德格尔那种多样性的言辞是相应的。策兰的某些明显矛盾的思路听起来似乎也直接来自海德格尔:“那隔离了今天和明天的墙壁,必须被摧毁,而明天也将会成为昨天。(GW 3:156)”策兰还像海德格尔那样,用现存的名词来合成新的名词:“Das Morgen-Gestern(昨天-今天, GW 3:156)”。这是海德格尔的散文诗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做法。尽管策兰并不是在模仿一位他未曾阅读过的作家的作品,但这种言辞上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与海德格尔在语言的使用上,在某些方面是有着先天联系的。第二年,在给一位相识于巴黎的荷兰女性的信中,他无意中使用了一个近似于海德格尔式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处境。他称自己是一个“被四处抛掷”(ein Herumgeworfener)于整个世界的人。^[11] 在海德格尔的观念中,人被“抛掷(geworfen)”到了存在中。两者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

后来,策兰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了共同的兴趣和主题,而它们在

[11] Sars, “Ein solcher Ausgangspunkt wären meine Gedichte,” 24.